

护送李宗仁先生秘密回国的经过

丁国钰



丁国钰

(1916~)

1955年1月调入外交部。

1955年6月至1958年7月任驻阿富汗王国大使。1960年1月至1966年7月任驻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大使。1980年8月至1982年11月任驻挪威王国大使。1982年12月至1984年11月任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大使。

我于1960年至1966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在任期间，经历了不少事情，但最令我难忘的还是护送李宗仁先生秘密回国一事。

(一)

1965年7月初的一天，我突然接到由外交部发来的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李宗仁先生偕夫人郭德洁女士及程思远先生将于7月12日乘坐瑞士航空公司的道格拉斯客机，由苏黎

世起飞，经雅典、贝鲁特、卡拉奇到香港转道回国。考虑到美国的情报部门和国民党特务机关会采用各种手段进行破坏，他们不但在回国途中可能遇到很大困难，而且人身安全没有保证。因此周总理决定李宗仁一行三人到达卡拉奇国际机场后先下飞机，并指定我亲自到机场把他们接回大使馆，然后再找一个适当的时机，安排他们直接回国。同时强调此事关系重大，一定要严守机密，保证安全。

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后，我马上召集使馆党委成员开会研究如何落实。我们考虑顺利完成护送任务要分成两步：第一步是如何安全地把他们从机场接回大使馆；第二步便是再由我亲自把他们送回北京。但如何做好保密工作以达到保证安全的目的呢？在大家讨论研究之后，我决定采取一种危险性最小的办法：即他们下飞机后，不经过海关，不在机场休息室停留，直接接回大使馆。这样停留的时间短，接触的人员少，危险性就可以减到最小。实现这一步，是将他们安全接回大使馆的关键。

我被派到国外工作以来，一直遵照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教导，坚定地执行我国的外交政策，同驻在国政府及各个方面的人士广交朋友，并建立起了非常友好的关系。我和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总经理（原巴基斯坦空军司令员）在此之前就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他经常到我们的使馆来作客。周总理还指示用我的名义邀请他和他的全家到中国来度假，他也曾两次应邀来中国作客。我认为他是完全可以信任的朋友，是可以帮这个忙的。因此，就这件事

我直接找到了他。我对他说：我有一个私人朋友要来看我，他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所以我要直接到机场内去接他。因为他的身体状况不佳，为了尽快回使馆，就不准备通过你们的海关了。我希望把我的车直接开到飞机旁，以便让他一下舷梯就上我的车。他沉思了片刻随即满口答应下来，并为此作了具体安排，同时通知机场允许我的车从一个内部专用的侧门进入停机坪。这位巴基斯坦朋友为我们解决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使我们的车有可能在飞机还没到达时就顺利地进入机场，以便飞机一停，我们就能直接把车开到舷梯旁将客人接走。

在此之前，我并不认识李宗仁先生。为避免差错，事先我详尽地了解了这三位客人的背景和个人特征。与此同时，这三位客人在离开瑞士时，我们使馆人员也再三叮嘱他们：第一，飞机在雅典和贝鲁特停留时，千万不要下飞机；第二，飞机在卡拉奇停留时，会有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来接你们，他会告诉你们他的名字。

7月13日凌晨两点，瑞士航空公司的一架道格拉斯客机稳稳地停在了卡拉奇国际机场。我注视着舷梯上走下来的客人，根据特征辨认出走在前面的是程思远先生，紧跟着他的李宗仁先生及在后面的郭德洁女士。我赶忙迎上前去询问他们是否是李先生一行，他们说是，我介绍说我是中国大使丁国钰，是专门来接他们的，并马上请他们三位上了我的车。为了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当时他们三位没有带大件行李 仅有随身的小包。我们去了三辆车 我

坐一辆插国旗的美国林肯牌轿车，其他两辆是奔驰车。当我们这一行人离开机场时，不仅未被什么人发现，而且连海关也不知道，就这样我们顺利地返回到大使馆，此时已经是后半夜了。

但是第二天，国民党和美国方面就察觉到了李宗仁一行未到香港。他们估计李宗仁一行已经在卡拉奇下了飞机，而没有再飞往香港。于是，他们便开始在卡拉奇各个旅馆、饭店进行搜查。这一天，我也接到了国内的电报，说国民党准备在卡拉奇进行破坏，如果不成功，他们就要在缅甸上空击落我们的飞机。因为那时国民党在金三角地区还有残余部队，仍有一定的力量。

在使馆，我安排他们三人和我们夫妇一起住在大使官邸的二楼，李宗仁夫妇住在我们对面的房间里，程思远先生住在他们的隔壁。我们把万无一失地保证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先生的安全作为使馆的重要任务。我们将使馆人员组织起来，采取了轮流值班，日夜在使馆内巡逻等一系列安全保卫措施。使馆党委还向所有工作人员进行了保密教育，要让外面的人看上去认为我们使馆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们还要求他们三人在那几天不要出门上街，以免出事。但即使是这样，我们仍然发现有国民党特务在使馆外秘密寻查。

护送任务的第一步完成了，但我心里明白，后面的工作更加艰巨。为了缓解他们一行几天来的旅途疲劳和紧张情绪，使馆还为他们安排了一些文艺活动，放映了一些电

影，如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还有反映新中国经济建设巨大成就的纪录片及河北省军民团结互助，抗洪救灾的纪录影片，我们还找了一些介绍新中国的书给他们看。我特别告诉他们，为了保证他们的绝对安全，此次行动所采取的周密措施都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的，他们听后深受感动。

那几天，我除了每天上午处理公务以外，下午基本上和他们在一起聊聊天，并且连每天三顿饭我们夫妇俩都陪着他们三人一起吃。为了让他们在使馆内就能感受到故土的气息，我还特意派了一位擅长做南方菜的厨师，烧些家乡风味的饭菜给他们吃。由于我们在一起相处得十分轻松愉快，所以很快大家就熟悉起来了。我看得出，他们的紧张情绪也逐渐地缓和了下来。

李宗仁先生十分健谈，操着一口广西话，身材瘦小，但有一种经过严格训练的军人风度。那几天，我们谈了很多问题，他态度真诚坦率，从他的家庭谈到他上学、参军，直到当上国民党的高级将领。

几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接下来是该考虑如何回国了。国民党方面正在搜查他们，想办法破坏，当时国内将得到的情报都发给了我。最后我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决定于 7 月 17 日走，还是乘坐巴方的飞机。为了汲取“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血的教训，保证飞机的安全就成了最关键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得到巴基斯坦方面的大力合作。故而，我们决定把情况如实地告诉巴基斯坦政府，希

望得到巴方的协助。为此，我找到了巴基斯坦外长布托，又找了前面提到过的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总经理。我坦率地告诉他们：来看我的朋友不是一般的人，是原国民党的代总统李宗仁。他要回国见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我承担的任务是安全地把他们护送到北京去。现在就请你们帮我一个忙，借用你们的一架飞机，要经过严格检查的、绝对可靠的飞机。后来他们想办法从欧洲调回来一架新飞机，并向我们保证飞机上是绝对安全的，上什么人都由我们大使馆来决定，别的人一律不让上飞机。这实际上已经是一架专机了。

这次，我们还是选择在夜里走，用的还是那三辆车。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和美国情报部门的监视，在出发之前，我先让另外两辆车快速驶出使馆来引开特务，随后我们这三辆车才开出大门向卡拉奇机场驶去。进了机场，飞机就停在离跑道很近的地方，我们把车直接开到了舷梯旁，上了飞机。就这样，0点30分，我陪同李宗仁夫妇一行三人登上了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波音707客机启程回国了。李宗仁夫妇显得十分兴奋和激动，我心中也充满了喜悦。

飞机在途中的达卡（那时属东巴基斯坦，现为孟加拉国首府）加完油后又继续在万里高空飞行。李宗仁夫妇与我谈了一路话。当这架飞机飞经仰光上空时，我看得出他们也意识到了这段行程的危险，显得有些紧张。当飞机越过缅甸到达国界时，我告诉他们“现在已经进入中国境内了”，他们听了非常高兴。说话之间已是次日清晨，我们

正好飞临昆明上空，能很清楚地看到滇池了。首先是李夫人激动得跳起来，接着我们大家也都非常兴奋地鼓起掌来。此情此景，今天想起来依然那么清晰，令人十分难忘。

虽然当时我们的飞机还没有着陆，但肩负护送任务的我心里还是轻松了许多——毕竟，我们已经回到了伟大祖国的怀抱。到此时，我才告诉他们国民党特务曾多次计划要在中途拦截我们所乘坐的飞机，同时我告诉他们，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一直在上海密切关注着我们所乘坐的飞机沿途的情况。他们听后对蒋介石的狠毒十分愤慨，对周总理和陈老总无微不至的关怀万分感激。

7月18日上午8时，我们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李宗仁夫妇一行三人受到了中共中南局书记陶铸同志、广东省省长陈郁同志和当地其他党政军领导同志的欢迎。陶铸、陈郁同志和我陪同他们共进早餐。饭后略作休息，飞机继续向上海飞去。上午11时，飞机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以及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等党政军负责同志亲自迎接他们（实际上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是在上海迎接李宗仁先生一行的，并设宴款待了他们，但当时对此事未作报道），后来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乘飞机先行返回了北京。

7月20日上午11时，李宗仁先生一行等换乘中国民航专机到达北京首都机场，受到了以全国政协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首的党政军领导人，原国民党的很多高级将领，李宗仁先生的部下以及他在北京的老朋友和社会各

界知名人士的热烈欢迎。这样盛大的欢迎仪式使李宗仁先生非常激动，他举起帽子向人们频频挥动，对我们党和人民政府的盛情表示由衷的感谢。他在机场还宣读了声明，希望留在台湾的国民党人，凛于民族大义，为完成国家最后的统一作出有用的贡献。当晚，周总理接见并设宴欢迎李宗仁先生和他的夫人，以及随同回国的程思远先生。对此，《人民日报》21日头版头条作了详细报道。27日下午1时，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旁的休息室接见了李宗仁先生一行，谈话长达4个小时。

作为原国民党政府的代总统李宗仁，在新中国诞生以后，既没有留在长期居住的美国，又没有跑到国民党统治的台湾去，而是下决心回归祖国，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在当时是震惊中外的一件大事。他在国民党内资深位高，能够回到社会主义新中国来，对国民党的震动很大，这无疑是我们党对国民党军政人员政策的一次胜利，也是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又一次胜利。

（二）

李宗仁先生在美国居住多年后，下决心回到祖国，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回国的过程中，我们在一起谈了很多问题（包括他私下同我谈的），其中不少内容涉及他的个人情况和看法，以及他决心返回祖国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周恩来总理长期耐心工作的结果。周总理按照党的方针和政策，通过住在香港的程思远先生耐心细致地做李宗仁先生的工作。周总理与程思远先生进行过多次长时间的谈话，向他介绍国际国内形势，解释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同时指出不要再对美国政府抱有任何幻想。每一次谈话之后，程思远先生都把谈话内容和周总理的意见如实地转告给了李宗仁先生，使他对我们党的建国方针和建设新中国的能力有了较全面的认识和理解。特别是我们党提出了“爱国一家”和“爱国不分先后”，希望侨居海外的原国民党要员既可以回国走一走，看一看；也可以回来住一段；还可以回来一段后，再回去。总之，他们可以“来去自由”。对此，李宗仁先生深受感动。在归国途中的历次谈话中，他都向我表露出了对周总理的敬佩之情。他说在他下决心回到祖国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得到了周总理的开导与帮助。显然，周总理的多次谈话对李宗仁先生的归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当周恩来总理得知李宗仁先生最终下决心要回国的时候，反而劝他先不要马上回来。周总理考虑到当时如果他要直接从美国回来，首先就会遇到当时美国政府的阻挠和破坏，美国还有可能和在台湾的国民党联合起来对付他。因此周总理就建议他们可以先到欧洲去走一走，看一看，住一住，再按时回到美国去。这样可以先麻痹一下美国政府和台湾特务，等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之后再回来。他听从了周总理的建议，到欧洲去旅游了一趟，然后又按时回到

了美国。他对我们党的这些统战政策很受感动。

其次，有些客观条件对他下决心回归祖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 李先生在谈到自己家庭的时候，特别谈到他的夫人郭德洁女士，他说他与郭德洁女士结婚是当了军官以后社交及政治活动的需要，他与原配夫人的结合基本上是父母包办的，在结婚之前他们也见过两次面，他本人对这桩婚姻也是认可的，他们夫妻婚后的感情也是好的。但是他的原配夫人不善于交际 而在那个时代社交活动极为重要。举个例子来说，军官们在领到月薪之后，总要拿出相当一部分钱来用做交际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如果没有一位夫人参与就显得很不方便了。由于郭德洁女士很善于交际，而且也爱上了李宗仁先生，后来他们就结合在一起了。婚后郭德洁女士一直积极地配合他进行一些社交活动，帮助他同国民党各方面人士打交道，使得李宗仁先生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此次决定回国的时候，郭德洁女士本来是不想回来的，她怕回来后不适应国内的环境。可那时她已身患癌症，如果一个人留在美国，李宗仁先生是放心不下的。他告诉我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对夫人说：你有病，我不能让你一个人留在美国，你回去可以看看情况，换换环境，采用祖国的传统医学，再与现代医学相结合，也许能取得好的治疗效果，如果你真的适应不了国内的环境，我们还可以再回来住一段，周总理不是讲了来去自由么。经过几次劝说，郭

德洁女士最后终于答应同丈夫一起回到北京来。

2. 李宗仁先生作为一名军人，还是很注意军事方面的问题的，他说当中国军队开过鸭绿江支援朝鲜人民作战的时候，他是很担心的，因为他多少了解一些美国军队的情况。二次大战后，美国已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配有先进的武器装备，相比之下，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在国内战争刚刚结束还未来得及休整和装备的队伍。但是我们最后把美国军队赶到了“三八线”以南，战胜了美国人。他告诉我，我们这次军事上的胜利对他震动很大，使他觉得新中国不仅有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领导人、杰出的军事指挥家而且中国人民志愿军也是一支很了不起的武装力量。后来他又陆续听到了一些信息，新中国已经能够自己制造坦克、大炮和飞机。特别是1964年10月，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海内外所有的炎黄子孙包括李宗仁先生在内无不感到欢欣鼓舞，喜讯传来使他看到了新中国的国防力量又有了更加可靠的保障。同时，李先生也了解了不少新中国在各个方面建设的伟大成就，如工业、农业，特别是水利建设方面，令他感慨颇多。作为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先生对旧中国的贫困落后状况是很清楚的。当国民党败走台湾的时候，国民经济已经崩溃，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留给中国共产党的是一个烂摊子，接踵而至的抗美援朝又花费了我们众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中国共产党克服了重重困难，使国民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李宗仁先生认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事情。

3. 他还谈到了蒋介石本人的私生活，以及蒋介石是如何排斥异己，建立并实施其独裁统治的。为了巩固其统治，蒋介石建立了庞大的特务机构 到处进行监视暗杀活动 凡是蒋介石本人认为不可靠的人，他就会想方设法把对方搞掉。

他也逐步看清了美国政府不可能再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虽然美国和台湾之间有共同防御协定，并一直明目张胆地支持台湾 但是美国想要帮助蒋介石打回中国大陆 无论是从国内还是从国际形势来看已经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了。

此外，在他的谈话中，可以感觉到他有一些实际的问题与困难。

他不时地流露出在美国居住时的苦闷和孤独之情。在那里人生地不熟，又没有朋友可以聊天，电影电视也看不懂，到了那里就好像是脱离了社会一样。他深知自己已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不会再有什么太大的作为了，十分思念自己的祖国和故乡，中国有句老话：树高千丈，叶落归根，这样他也渐渐地产生了回国的念头。但是，他告诉我国民党统治的台湾他是绝对不会回去的。虽然在南京的时候，他当上了国民党政府的代总统，但实权仍掌握在蒋介石的手中，他李宗仁不过是一个政治上的傀儡罢了。蒋介石对外宣传自己下野，只是迫于社会上的压力所作出的一种假象。最后国民党彻底失败了，蒋介石自然又将全部

责任一股脑儿地推到了李宗仁的身上，因此他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已经是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了，所以他对我说：台湾，他李宗仁是决不回去的，而他们这些旅居国外的中国老人总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来的。这一切都促使他最后下决心回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与广大人民一起为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正如前面我所叙述的那样，周恩来总理在得到了李宗仁先生要回来的消息后，就派程思远先生到欧洲去会晤他，让他们同中国驻瑞士的有关机构取得了联系。经过这一系列的安排，他们一行三人才到达了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最后由我负责接待他们，并把他们秘密护送回国。

总之，李宗仁先生能够回来，主要是周恩来总理长时间对他做工作的结果，程思远先生从中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能够参与其中并胜利完成任务，这在我的外交生涯中也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情。

难忘在柬埔寨的岁月

——忆陈叔亮大使外交生涯片断

康岱沙



陈叔亮

(1911~1995)

1950 年 3 月调入外交部。

1962 年 2 月至 1967 年 6 月任
驻柬埔寨王国大使。1979 年 1 月至
1982 年 12 月任驻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大使。

1962 年 2 月 我丈夫陈叔亮被任命为驻柬埔寨大使，自那时起，我和叔亮在这个美丽的国度共同工作和生活了将近 5 年半的时间，这段时期是柬埔寨的黄金时代，也是两国自 1958 年建交以来柬中友好的极盛时期。在这个期间，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私人交往中 我们与西哈努克亲王、莫尼克公主、王后及近臣们相处极为融洽和友好，可以说这是叔亮外交生涯最辉煌的时期，是我们值得自豪和永远难忘的时期。

美丽富饶的柬埔寨

柬埔寨是中南半岛上一个美丽富饶的热带国家。中部和东南部为湄公河及其支流的冲击平原；东部、北部、西部是山地；西南面海，形成了山水环绕的地貌特征。境内74%的土地被森林覆盖。在柬埔寨的西南部，有一条濒临大海的山脉，这就是豆蔻山。豆蔻山中峡谷很多，瀑布飞溅，远望好似银河挂九天。这些瀑布，有的已经被利用建成水力发电站。豆蔻山脉中的卜哥山是柬埔寨最著名的风景区和避暑胜地，有公路从山下直通山顶。巍峨的山岭、美丽的松林、凉爽的气候、飞溅的瀑布、便利的交通，每年吸引了不少的旅游者。柬埔寨的平原地区是它的主要粮仓，洞里萨湖和湄公河的湖滨河畔是东南亚的鱼米之乡。湖滨的居民们都住在高脚的房屋中，坐着小船出入，在我们看来真是别有一番情趣。在湖区，我们还看到很有意思的一种“浮稻”这是柬埔寨劳动人民经过长期的实践培育出的适合当地自然条件的优良稻种，有红、白两种。每年雨季来临之前农民就下种，随着降雨的增加，水位不断增高，稻秆也不断向上长，在一片汪洋中，总可以看到碧绿的稻叶在水面上浮动，这简直可以说是柬埔寨的一大景观了。

首都金边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市容整洁，花木扶疏，市政建设颇有章法。庄严的庙宇、塔寺，金碧辉煌的王宫，瓦脊尖顶，翘角飞檐，既显示出独特的民族风格，又使人感

觉到金边处在一种很浓的宗教和古老文化的氛围中。以后，在我和叔亮接受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公主之邀几乎走遍柬埔寨的时候，我的这种感觉就更加深刻了。当时，虽然除吴哥古迹之外，柬埔寨各地富丽堂皇的建筑不多，但佛教寺院分布很广，僧侣到处为人们所尊重。当我面对着吴哥散布在 60 平方公里丛林中的 600 多座大、小各式建筑物，远望着阳光下吴哥寺如出水莲花般美丽的五座宝塔时，我情不自禁地为高棉民族的神奇创造力，为柬埔寨灿烂的古代文化发出感叹。它不愧是堪与中国的万里长城、埃及的金字塔、印度尼西亚的布鲁布都古刹媲美的古代东方的四大奇迹之一。

开明、爱国的亲王

1955 年亚非会议开幕前，叔亮在万隆机场第一次见到西哈努克亲王。那时亲王风华正茂、风度翩翩。在叔亮看来，这位柬埔寨王国的王子不过是一位生活优裕的贵族。然而，周恩来总理却对西哈努克颇为赞赏，说他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一位开明、爱国的亲王。

在叔亮任驻柬埔寨大使以后，和作为国家元首的西哈努克亲王有了更多的直接接触机会，对他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便更深刻地体会到周总理对西哈努克亲王的评价。西哈努克不仅是一位开明的元首、出色的国际活动家、爱国的国王、虔诚的佛教徒，也是一位多才多艺、情趣广泛的

博学者。他有着独特的个人魅力。

西哈努克亲王在第三世界中是一位杰出的国家领导人。他在国内受到人民的爱戴，在国际上受到广泛的尊敬。在他执政的二三十年里，对内不搞暴政，努力发展生产建设，不利用权势把国家财富转移到国外变成私人所有。在国际上，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西哈努克亲王与铁托、尼赫鲁、苏加诺、纳赛尔这些著名人物齐名。由于他所奉行的独立自主的政策，由于他与美帝国主义所进行的长期斗争，使柬埔寨在 50—90 年代这个漫长的时期内，特别是在 60—70 年代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柬埔寨是个小国，但西哈努克却让它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纽约时报》的记者安东尼·刘易斯曾这样评价西哈努克：“直到 1970 年，管理柬埔寨的是这么一个人：他所关心的不是意识形态或者政治逻辑的问题，而是他的人民在多灾多难的世界里的生存问题。在越南战争期间，西哈努克亲王根据需要或站在这边或站在那边，保持左右均衡。他允诺越南北方可利用柬埔寨东部诸省境内一些地方做庇护所，因为他没有别的办法。但是，他的不完全中立，已被证实对柬埔寨是有益的。戴高乐将军也说西哈努克采取了“非常强有力而又极为灵活的态度”。可见西哈努克就是这样带领着柬埔寨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争夺的夹缝中谋求生存和发展的。

西哈努克遇事不优柔寡断，对国际重大事件明辨是非，主持正义，不畏强权，确实难能可贵。